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刘 继 增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致力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论证了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成败的一系列理论命题,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理论诞生于中国,既决定于中国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又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环境有关,即有着成熟的历史条件。

一

自从1840年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内部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变化。近代中国成为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

第一,近代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宰割和争夺的对象。

在金融资本时代,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大大加剧,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也空前尖锐化了。中国是一个有数万万人口的、土地广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是全世界极重要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垂涎不已,你争我夺的一块最大的肥肉。帝国主义曾经协同一致的镇压过中国的反抗战争,如1858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屠杀义和团的爱国群众,1927年帝国主义联合破坏中国第一次人民大革命,形成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置中国人民“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①。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占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益,实现其争夺霸权的野心,它们之间也就形成了不可调和的深刻冲突。它们今天的暂时协调,往往意味着明天更大规模的斗争。由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的激化,使得它们争夺中国的矛盾也发展起来。这就是说,它们对中国的宰割并不是统一的、铁板一块的,而是分裂的,相互矛盾的。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不仅加剧了它们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且大大激化了中国社会所固有的种种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第二,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并由此而演化为长期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

中国是一个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于一国支配的殖民地。帝国主义通过支持、培植封建买办阶级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实现其对中国的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长期的分裂。党的“二大”宣言指出:“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这种情形,成为“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哄的复杂基

础”②。

这种“纠纷内哄”的尖锐的集中的表现，就是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③。这种情况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表明，中国统治营垒中的豪绅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分别附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和代表着不同的地方封建势力，他们内部是长期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

第三，外国侵略者同中国封建统治者逐步地勾结起来，实行联合的剥削与压迫，使中国人民横遭极深重的灾难。

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日益的贫困化、失业以至大批的破产，过着世所罕见的饥寒交加的贫苦生活。在政治上，他们毫无政治权利，其不民主、不自由的程度，其所受迫害之深，为世界各国所少有。

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们的目的是要变独立的中国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不是把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因之，它们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依靠地主阶级作为其控制中国的社会基础，就不但残酷压榨了劳苦大众，而且也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交织着各种各样的激烈而复杂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买办官僚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在这许多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支配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都不是孤立的、静止存在的，它们不仅相互作用，而且都受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巨大影响。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近代中国孕妊着革命的程度及其复杂程度，比东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

近代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这不仅是说它是各帝国主义相互间激烈斗争的焦点，也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中国有着特殊丑恶的表现，中国曾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战略后备，而且还因为中国是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在中国具备了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必要条件。中国人民有着先突破帝国主义加在东方人民身上的枷锁从而赢得胜利的力量。

首先，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形成了与之对立的物质力量——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因之，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又具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已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过程所充分证明了的。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中国资产阶级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在经济上，他们开办了新式工业，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作出了贡献。在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曾经发动过戊戌变法，领导过辛亥革命，反对过袁世凯的复辟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他们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当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后，他们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者。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中国资产阶级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而发挥着作用的。

中国无产阶级是个有特殊战斗性的阶级，这种战斗性形成的原因除去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个人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其特殊的根源。（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坚决性。（二）由于工业的集中，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的集中。这种集中性表现在：地区上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大城市；行业上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等方面；人数上比较集中于大企业，中国工人阶级比沙俄时期工人还要集中得多。由于集中，就使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容易表现，斗争的智慧和力量容易集中，大城市是敌人统治中心，斗争对敌人能产生较大的威胁。（三）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占少数，但在中国社会上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很多，全国城乡各种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却是一个极巨大的数目，他们是工业无产阶级血肉相联的兄弟，最广泛的同盟者。由于有了这个条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无论在乡村或城市进行斗争，都有着可靠的依靠。

上述特点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有特殊战斗性的阶级。这个阶级一经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组成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它就成为能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赢得彻底胜利的唯一阶级和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伟大的力量了。

其次，帝国主义依靠封建买办阶级，依靠它们造成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加紧对农村的掠夺。同时它们又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据毛泽东同志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其中一部分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的依据。另一部分虽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仍然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着悲惨的生活^④。在党成立后，在第一次人民大革命时期，他们迅速地组织和行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成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力军。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

再次，随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在中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阶层。他们同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不同，而属于新式的、掌握有一定科学文化的大小知识分子。他们中除极少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以外，大多数人则走向了帝国主义的反面，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总之，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集合点，帝国主义把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集结为一团，因而大大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开展。帝国主义驱使中国的人民大众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斗争的道路。

二

长期复杂而曲折的中国革命，积聚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这种经验，为民主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前仆后继，英勇不屈，从没停止过，我们中华民族越是面临危亡威胁的严重关头，越是显示出它那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中国各族人民从未向任何反动王朝屈服过，每一次外国侵略者及其仆从的压迫、宰割狂潮，都不可避免地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抗热潮。列宁在赞扬中国人民这种极其高贵的品格时指出：“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⑤

马克思指出，鸦片不曾发生催眠的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三元里人民举起了反英大旗，在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顾官方的屈膝求和，自己奋起打击侵略者的力量和决心。在这之后十年，一八五一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及十八省、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旧秩序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怒潮。接着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至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和作为新旧民主革命分水岭的五四运动，相继发生，这种斗争不屈不挠，再接再厉，此伏彼起，绵延不断，规模越来越大，队伍越战越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近代革命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党成立不久，就深刻剖析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情，破天荒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随后又发动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些斗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能灭亡中国，结果是在神州大地上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残酷的。要战胜这样的敌人当然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革命力量非经过长期的聚积和锻炼是不能成为一个足以最终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此，它的发展必然是长期而又曲折，复杂而又尖锐的过程。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曾经形象地描绘了这个过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⑥这一历史的进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

让我们来看看在一个长期处于革命怒潮的大国中，特别是在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时，中国革命所呈现出的曲折、复杂而壮阔的历史画卷吧！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第一阶段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和国内外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及其在各条战线上的展开，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革命敌友的变化与阶级关系的重新组合，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各方面的矛盾都充分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胜利和曲折，进攻和退却，两次历史性的转变和多次历史性的转折，“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各地革命运动的极端不平衡状态，革命斗争形式的多种多样及其同时或交替的运用，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在中国广阔地面上的开展和变化多端的战略战术，都表现出中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在这期间，工农运动发动和组织的规模，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没有过的。此外，反革命势力的狡诈和残酷、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特性的显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斗争的英勇悲壮、各方政治势力的组合和分解，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任何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斗争所不可比拟的。

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不仅极大地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极大地锻炼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聚积了无数丰富的经验。这无数的包括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在内的丰富经验，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成为民主革命的科学体系，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这一重大的理论任务，正如它没有领导完

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一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曾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暴力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可是他们并未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自成体系的民主革命理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夹缝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基础非常脆弱,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因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着很大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勇气。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历史的发展却老是先生侵略学生,向西方学的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他们也曾向昨天的中国寻求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又由于世界观的限制而没有能力对古代的思想文化进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科学分析工作,他们或者企图调和古今,托古改制;或者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古今中外绝对化,好则绝对地好,坏则绝对地坏。他们也很关心不断总结自己斗争的经验教训,但是一则由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缺乏对其本质的认识,提不出明确的反帝斗争的纲领;二则由于他们没有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的领导,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从而不能很好地对经验教训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总结;三则由于他们与人民群众缺乏联系,不敢放手发动工农群众起来斗争,人民中所积聚的斗争经验,他们也就不能较好地加以总结提高。以上种种原因,使得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定领域里,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对某些问题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总结,给人们以启发,但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谈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上的重担不得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代表人的肩上。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形成和发展了适合我国实际的、完整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理论,完成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继续发展的历史任务。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并且逐步地同中国工人运动、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依靠近代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还在它的幼年时期,就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依靠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依靠与人民群众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依靠全党同志集体的努力奋斗,不断地把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所提供的丰富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概括成为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理论和政策,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证明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⑦。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社会条件下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准备好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客观条件，而且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特殊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我们党的这一特性，保证了新的民主革命理论在中国被成功的创立起来，而我们党一开始就成为这样的新型政党，则是与党在创建时期的特殊条件分不开的。

首先，由于党是在布尔什维克已经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产生的，这就使党的建设有了列宁党这样一个活的榜样作为依据，并且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的革命学说，制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战略策略的一般原理。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各民族不可避免地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列宁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正确地估计了东方各民族革命运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列宁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世纪剥削制度。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支持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并争取实现自己的领导权。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又要绝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所指出的这些思想，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并使我们党在理论的创造活动中处于优越的地位。

其次，中国没有欧州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不容许工人阶级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社会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长、壮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因此，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就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

由上述种种条件形成的特殊环境，使党的建设处于有利的地位，同时也为党创立新的民主革命理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国际条件。例如：党还在幼年时期，就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命题；论证了中国民主革命必须同反帝的民族斗争相结合的特点，并由此而提出了民主科学的科学纲领；强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统一战线时要坚持党的独立性等等，充分显示了在中国思想界和政治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活力。但是，有了这种特殊环境，能否就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是轻而易举的呢？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就不需要经历一番艰难曲折的经验积累和理论的独创过程呢？不！决不是这样，我们党在理论上所面临的任务还是极其艰巨的。

一九一九年，列宁曾经对东方共产主义者发出号召：“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他说，这是一个特别崇高的任务，同时又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⑧

一般地说，每一个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解决列宁在这里所提出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近代东方革命中的各种问题，都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特殊地说，

在中国这一点就尤其突出了。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很大的特殊性；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来自这个阶级，这个阶级的思想作风给党的影响是很深的；由于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还很不发达，资产阶级在其长期的政治活动中，对中国国情也未曾作过系统地周密地调查，没有留下可供分析、研究的比较完备的资料；由于国际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供借鉴，完成任务的解决方法只有依靠自己独立的经验等等，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解决好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形成完备的革命理论，这的确是一项特殊的事业，艰巨的事业，困难的事业，是一项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系统地提出过与解决过的事业。

要完成这样特殊的、困难的任务，只是熟读、背诵和摘抄马列主义的著作行吗？很明显，这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万古不变的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反复强调的观点。早在三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代表党首次自觉地提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

那么，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行不行呢？历史证明，这样也是要碰壁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应该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以弥补自身之不足，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经验，从来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党在这方面是吃过不少亏的。在三十年代初，使中国革命陷入严重危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在于不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只是依据什么“本本”上的“公式”，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这个教训是极深刻的。

显然，以本本主义为特征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可能完成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任务的。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会上论述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⑦⑧}正是毛泽东同志依靠全党同志的集体智慧和努力，杰出地进行了这项光辉的事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列宁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思想、原理的提出，都不是任意的，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关系的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再一次证实了这一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性。

注释

①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

③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④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⑥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373页。

⑦⑧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336页。

⑨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